

“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民生建设的初步探索

张瑞敏 荆幼阳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一五”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民生建设的初步探索期。“一五”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的如火如荼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民生建设的两大历史背景。此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对城市民生建设问题形成了诸多重要的认识;其城市民生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过深刻的社会危机,其探索所形成的模式与经验对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民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2)02-0090-06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与此同时党的工作重心正式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如何管理好、建设好城市,解决好城市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否站得稳脚跟、守得住天下的关键所在。“一五”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民生建设的起步阶段和初步探索期,它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所形成的模式对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五”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民生建设的初步探索期。如何处理好当时所面临的种种关系与矛盾,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把当时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归纳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的是否恰当。”^[1]围绕着这一难题,中共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所形成的理念不仅作为当时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民生发展。

1. 仁政”要服从“大仁政”——“风物长宜放眼量”。“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2]109},这一点在当时的党中央是个共识。依据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当时普遍认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而且从长远来考虑“归根到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的不断提高”^{[2]133}。由于“一五”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方面,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开支(如刘少奇在以后的总结中就提到“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国家的军政开支是很大的,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估计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32%”^{[3]227}),导致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分析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了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如果首先只想改善人民生活那是小仁政,而首先先把独立的工业和经济国防搞上去,那才是大仁政。”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4]201}。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3]228}。“风物长宜放眼量”,应该说,毛泽东的这句诗词可以比较好地表达党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

2.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统筹建设,兼顾

收稿日期: 2011-09-10

基金项目: 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研究”(YSY10006)。

作者简介: 张瑞敏(1965—),女,河南省洛阳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E-mail: 550781790@qq.com

民生。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党内高层是高度一致的,但是注意妥善处理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关系、不要把经济工作与人民生活割裂开来的观点在“一五”时期也已经形成。关于这一点,当时主管政府工作的周恩来认识更为深刻些。他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之所以是相互一致的,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就背离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有人提出要追加这年的基本建设预算时,受到了与会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给老百姓带来一系列的生活困难。这年的11月,周恩来在《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报告中,强调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他特别指出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的话。他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腰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求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的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他还特别指出,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2]230}。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时间分管党和国家财经工作,“一五”计划从制订到实施,陈云都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在编制“一五”计划时,陈云就指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当然,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稳定民生、稳定市场。”“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5]276}他比喻重、轻点是“骨头”与“肉”的关系。如果完全保证重点、削“肉”,有一天矛盾总会爆发。完全削轻点是不对的,削重点要分析,目的是为了多生产,物资分配先照顾最低限度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5]253}。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5]30},并认为这是安排建设和民

生关系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是判断建设和民生关系是否正确标准。

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这是在我国物质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看待和处理这种矛盾的一个基本观点。“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则是这一观点的朴素表达。

3.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从党的宗旨上认识民生问题。“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5]252},这是中央领导人在“一五”时期多次表达的观点。刘少奇强调,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衡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保护与增进工人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包括日常切身的与根本的,个别的部分的、暂时的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在内,不独是一切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是共产党一切斗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并进一步指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从建设的根本目标上、以战略的眼光来辨析、看待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所形成的另一重要的观点。

4. “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从政治的高度思考民生问题。“一五”期间,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改善民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正如陈云所指出“现在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人民群众固然关心重工业,但更关心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和商业工作,“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重工业,它直接影响

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看，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头来还要解决。”^{[6]89}1956年，当我国城乡出现猪肉供应紧张、老百姓吃肉难时，陈云从政治的高度指出：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商品脱销问题，而是影响党和人民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矛盾会越来越尖锐。”^{[6]87}他说，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现在不是延安时期了，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地考虑。从任何一件事考虑都是可以搞的，但是，一个上去了其它的都要跟上去。如果只顾国家计划，不顾社会部分，要出乱子^[7]。他提倡共产党员都应该关心民生，支部要“用极大的注意去关心和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的哇哇叫。”^{[6]88}这些颇有见地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的认识高度。

5. 职工生活的几个“应当”原则——关于城市民生建设安排的几点具体经验。1956年，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出了“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遵循的几个“应当”原则。一是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二是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三是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四是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五是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3]232}。这几条是对此前几年城市民生建设经验的具体总结。

二、“一五”时期城市民生建设的实践与成就

一五时期国家在城市民生方面所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整个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尤其是工业建设发展迅速，带动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有很大增加。1953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了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1953年的7、8、9月份，各地出现粮食危机。这3个

月共收进粮食98亿斤，虽然超过原计划7亿斤，但是销售124亿斤，超过原计划19亿斤。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了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一年的国内贸易粮纯销售量由上年的467.8亿斤猛增到623.2亿斤，增加了31.1%。这种紧张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粮食严重脱销的混乱局面，有可能牵动物价全面上涨，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努力实现物价稳定的成果付之东流。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认为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势在必行，在多方案比较下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10月，中央通过了相关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下达执行。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销的具体办法是：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则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粮食的计划供应，涉及到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到1955年春以致全国城乡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的局面，人心浮动。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应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分别规定每月口粮定量标准，并发放粮票。整个“一五”时期，由于农业的增长落后于工业的增长，粮棉紧张的局势一直未能根本缓解。同时，鉴于同样的经济形势，“一五”期间国家统销的物资品种也是逐年增加，钢材、水泥、胶鞋、棉纱、卷烟、热水瓶等主要建筑材料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日用品都相继实行计划供应。到“一五”计划完成时，这些重要的消费品已经全部为国家所掌握。

对于重要的消费品实行计划供应，以限制消费来平衡供需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五”时期我国城市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与举措。统购统销政策作为当时解决经济问题的应急之策而出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从此进入了“票证”时代。

“一五”时期，是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起始阶段。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开始出现，与之配套的、直接关系民生的公共交通、文化教育设施、福利设施、生活设施等公用事业基本建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表现在工资收入方面，“一五”期间，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各年的工资总额都在不断增长。全民所有制

经济部门,1957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88.9 亿元,增长了 131.7%。集体所有制经济各部门,1957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33.6 亿元,增长了 42 倍。1957 年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 2451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了 55.1%。国家职工货币工资比 1952 年平均提高了 36.8%,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由 1952 年的 446 元增至 1956 年的 610 元。从 1956 年 4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又实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 1956 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 1955 年提高 13% 左右。使当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 1952 年提高了 33.5%,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 33% 的指标^{[2]216}。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 13% 左右,到 1956 年 4 年总计约 44 亿元,4 年间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公尺^{[3]223}。1957 年,全国人均消费水平达到 102 元,比 1952 年提高 22.9%。社会整体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以烟酒为例,品种增多,高质量烟酒需求增加,仅 1956 年一年中,甲级烟由上年的 0.69% 上升到 0.85%;乙级烟由上年的 22.24% 上升到 24.23%;丙级烟由上年的 42.72% 下降到 36.5%。名贵酒类由上年 2.31% 上升到 3.54%;白酒由上年 80% 下降到 74.63%,黄酒、啤酒分别由上年的 14.46%、3.23% 上升到 17.12% 和 4.71%^{[3]223}。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到 1956 年均超过 50%,年住公房人均面积 3.95 平方米,私房则为 3.4 平方米,并且公房租金低于私房 30% 以上。

全国交通运输业有巨大发展。到 1957 年底,全国铁路公里通车里程分别由 1949 年的 21989 公里、80768 公里增加到 1956 年的 29237 公里、226318 公里;达到 29862 公里,比 1952 年增加 22%。5 年内,新建铁路 33 条,恢复铁路 3 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共约 1 万公里。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都先后建成。到 1957 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5 万多公里,比 1952 年增加 1 倍。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通车。航空航线长度由 1950 年的 11387 公里增至 1956 年的 19082 公里,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城市公交车也发展迅速,以北京为例,1956 年有轨电车共有 240 辆,是 1949 年的 8 倍,营业里程 49.98 公里是 1949 年的 7 倍,自行车也成为人们普及的交通工具,1957 年北京市有 1/3 的家庭有自行车。

就业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截至 1952 年,全国仍有 376 万城镇失业人

员。为了缓和就业带来的社会矛盾,“一五”期间,党和政府继续多方努力,采取了“国家统包统配”、“分口包干、统筹安排”、“城镇失业人员下乡劳动”等就业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1957 年城镇社会劳动者人数比 1952 年净增加 719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 5.2%;1957 年工业会员劳动生产率比 1952 年净增加 2189 元/人年,年平均增长率 15.5%。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确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加之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1953—1957 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23.79%,每年新增一千多万人。1957 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35 岁迅速提高到了 57 岁;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 10.6 张增加到 33.9 万张^{[3]239}。同时,到 1956 年全国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职工达到了 1600 万人,签订集体保险合同的职工有 700 万人。这些都给城镇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最扎实的保障。

在教育方面,扫盲运动取得很大成绩。截止 1957 年上半年,全国文盲中已有 2200 万人脱盲,并已有 160 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在高等教育方面,受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大工业发展的影响,教育界增加了工学院的独立设置。并将 7 所工科高校进行战略性转移,使东部沿海与内地高校均衡分布,共同发展。据 1956 年召开的八大报告提供的数据:拿 1949 年同 1956 年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 11.6 万人增加到 38 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从 126.8 万增加到 586 万人,小学生人数从 2439 万增加到 5770 多万。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 1 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 16 亿册^{[3]239}。1957 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更是达到了 47 万人左右,超过了原定指标约 9%^{[2]215}。

在民众娱乐方面,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和便利来享受文化成果。文化艺术、文化事业单位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电影放映单位,1949 年有 646 个,1952 年有 2285 个,1957 年有 9965 个。艺术表演团体,1949 年有 1000 个,1952 年有 2084 个,1957 年有 2884 个。文化馆、图书馆,1949 年有 55 个,1952 年有 83 个,1957 年有 400 个。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意在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

三、一五时期城市民生的症结及原因分析

“一五”时期的城市民生建设当然不是孤立的,

它与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密切相关。有两大历史背景关联最大。一个是国家“一五”建设的全面展开。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前途就进行了大手笔的擘画,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地提出要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百业凋敝,重工业方面几乎为零。初掌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随即带领着人民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生产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中国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力量仍然极其的薄弱,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非常有限。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35.5%。同时,外有抗美援朝战争的压力,内有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还要争取落实苏联的援助计划。为了保证各方面建设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集中全国的经济实力、资金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不二的选择,“一五”建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一个言简意赅的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4][198]}认为这是实现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体现。由于“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工业建设的目标,是把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国营工业上,这便不能不对党的城市民生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毕竟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盈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又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需求。这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生产和需要、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一客观现实就要求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全体人民不能不为此作出牺牲,节衣缩食,艰苦奋斗。

“一五”时期城市民生建设第二个大的历史背景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如火如荼。1952年9月,毛泽东首次提出,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心内容就是“一化三改造”,提出: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建设体现的是工业化的追求,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改造到1956年年底也基本完成,中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为中国未来的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着要求过急过快,工作方法粗糙简单,追求单一所有制和单一计划体制,造成了忽视市场机制、过分集中等问题的发生。对城市民生造成的影响主要是,一些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下降(如在北京,群众反映“东来顺”涮羊肉不好吃了、全聚德的烤鸭不如以前爽口),按钟点开店营业等,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说: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3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他说地下私营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的、合法化的;要搞“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陈云等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调整思路。

“一五”建设、统购统销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涉及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带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也不能不对民生产生一些负面冲击力。问题与矛盾在“一五”后期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我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罢课和请愿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根据薄一波同志记述: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在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农民闹退社、闹粮荒的事件。中央客观地分析了产生这次社会风波的原因。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在这场危机中,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词汇,并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刘少奇也表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他指出:利益分配不公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因此他建议好好研究利益分配问

题。他还指出,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工商业改造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3][231]},也是造成了一些生产企业责任心减弱和生产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一些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党中央一致的看法是:领导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工作中存在错误,不能满足部分群众的利益要求是危机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在这次事件处理中,党中央没有推诿矛盾,而是从自身找原因,找对策,很快化解了这场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一五”时期中央领导人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在观点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也有所差别和侧重。毛泽东“提倡关心群众生活”,认为“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不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还是更多地强调长远的、整体的、集体利益的,认为它们本身已包含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相对而言,在一线直接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对现实民生问题的解决更为关注,主张“一能吃饭、二能建设”,将吃饭放在建设之先,更加侧重强调把民生放在第一位,首先保证市场需要,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然后有余再搞建设,强调建设规模首先不能挤掉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不使人民的负担过重等。

“一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起始阶段,也是我们党关于城市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八大在关于政

治报告的决议中特别指出“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增加国家的积累,为此,“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但是,积累的比例又不能过高,避免损害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要既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要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9]。“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2][226]}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其所形成的认识是党在实践中对经济建设包括城市民生所作出的初步经验总结。但总体而言,由于国力所限和工业建设优先安排,加上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一五时期还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与改善。生活资料短缺、城市居民就业、人民生活温饱等问题在短时期内也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工资的增加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更多的家庭人口”,“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2][133]}。

对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有一定程度的察觉。但在此后纠正的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2][231]}。此后的历史确实证实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高长武. 1956 年周恩来、朱德对《论十大关系》的阐释和发挥[J]. 党的文献, 2007(3).
-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刘少奇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5] 陈云. 陈云文选(1956-1985)[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6] 雷国珍, 肖万春. 民生中国[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7] 蒋永青. 陈云与 1956 年反冒进[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2(7).
- [8] 林蕴晖, 范守信, 张弓. 凯歌行进的时期[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636.
- [9] 罗平汉, 倪海东. 强国序曲: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103.

(责任编辑 何海涛)